

清季西北旌善馬隊研究

陳旺城

國立宜蘭技術學院人文及科學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 要

旌善馬隊係清季同光年間左宗棠為西北征戰之所需，在中國本部及東北地區求之不果情況下，於陝甘就地收撫回民中，揀其精壯，旌獎其善，所編立之騎兵部隊。這支馬隊在關隴河湟綏靖及新疆收復諸役中與劉錦棠所率老湘軍併肩作戰，雖功過爭辯殊異，但極具關鍵性影響。然史學界對此一相關之研究，至今尚付闕如，故為闡明其始立緣由與它在清西征軍中所起的作用、功過及餘響，分論之如下，並予辯正其歷史地位及應有之肯定。

關鍵詞：旌善馬隊、阿古柏伯克、穆斯林、依禪、蘇菲派、納合西班底教團。

A study on the Jin-Shan Cavalry in Northwest China in the Ching Dynasty

Wang-Cheng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Humanities and Science Education Center, Il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need to fight in northwestern China and a lack of skillful riders in China proper, Tso Tsung-Tang established the Jin-shan Cavalry during the Kuan-hsu period in Ching Dynasty by recruiting among the Muslims in the Shen-Kan area. This troop fought along with the Old Hsiang-Chun led by Liu Chin-tang in many battles in Kang, Long, Her, Hwang and Chinese Tankistan. Al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troop, it did play an instrumental role in these battles. Few studies have been done in this are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is cavalry, evaluates its contributions and influences, and argues for it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Keywords: Jin-Shan Cavalry Yakoob Beg Muslim Ishan Sufism °
Nakshbandiye

一、前言

滿洲定鼎中原，建立中國最後一個王朝 - 清朝，在其總計二六八年的統治裡，除聖祖平三藩(1677-1682)、收復台灣(1683)外，基本上，西北用兵頻仍，尤其嘉道以還，國勢中衰，廣大西北地區更成為清政府塞防上的重要軍機所在。而鴉片戰後，太平軍起，中原紛亂影響之所及，陝甘寧青民族、宗族統治政策失調，新疆又外力介入爭逐，回民生事，由西南而西北幾釀至不可收拾地步。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奉命督辦陝甘軍務，正關隴捻回連結、多隆阿整屋陣亡、楊岳斌部蘭州兵變、阿古柏入侵新疆的危急存亡時刻，故他以所部親軍及先前入陝的劉松山、劉錦棠老湘軍為主力，毅然西行，採先捻後回、先陝後甘、由東而西、緩進急攻、剿撫兼施策略，並於塞海防之爭後，出關新疆驅逐外力。其間用兵，所獲由劉松山、劉錦棠等在陝北收撫之董福祥部董字三營，固原投誠之馬柏森、穆進善、王益萬等旌善三營，平金積時由就撫回民挑精壯四百名「隨官軍征剿」，編入「旌善營馬隊」(註1)及攻西寧時歸順之崔偉等旌善五旗馬隊與河州馬占鰲降後「編為鎮南馬步三營旗」(註2)。配合擅長山谷作戰的老湘一軍，而終能完成西北綏靖與新疆之收復的重大勝利。然而在這長達十餘年的軍事平定戰役中，劉錦棠所領導的老湘軍之貢獻，自不在話下，而當時同隸屬劉錦棠所指揮的西北健兒們的表現更是不可或缺，尤其面對同是伊斯蘭(Islam)穆斯林(Muslim)教胞的旌善馬隊在各階段的適時發揮作用，更具關鍵性，甚至直迄庚子禦侮之役都有深遠的影響。茲為分論此一由西北回民所組成之馬隊營旗建制經過緣由及其在西征清軍中之作用與功過爭辯而述之如下：

二、旌善馬隊成立緣起

西北地區，由於歷史原因與地理位置關係，自古以來即民族複雜、文化多元，尤其長期為中西陸路交通之樞紐，伊斯蘭教自唐朝之始傳與宋元之發展結果，元時已「回回遍天下」(註3)，所以它一直都是穆斯林同胞的聚居區。而新疆在十五世紀後半葉伊斯蘭一元化，更使陝甘到了清代除了明時曾是伊斯蘭教徒居住最多的臨洮為中心外(註4)，其他河州、皋蘭、鞏昌、安定、會寧、渭源、秦州、固原、西寧、平涼、靈州、伏羌、涼州、肅州、鹽茶廳等處數十州縣，也都是清代穆斯林聚集最多的地方(註5)。又「陝省與甘肅接壤，回民甚眾」(註6)且約十七世紀「阿帕克和卓」(註7)由新疆三次造訪西寧傳授「納合西班牙底教團」(註8)的蘇菲之道，開啟了建立「蘇菲教團」(註9)之門，把新疆通稱的「伊禪」(註10)在甘寧青「逐漸與儒道思想結合，遂形同了『門宦』」(註11)，在中國伊斯蘭教內部起了很大的變化。」(註12)十七世紀末，蘇菲教團中的一些支系，又由阿拉伯、新疆傳入甘、寧、青穆斯林聚居區，於是，以陝甘為中心的狄道、循化、河洲等地，分門別類的產生了虎夫耶

(al-Khufiyyah) 嘎的林耶(al-Qadiriyyah) 哲赫忍耶(al-Jahriyyah) 庫布忍耶(al-Kubrawiggah) 四大門宦，對中國西北地區的伊斯蘭教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因教派互異而教爭不斷。且清政府一味偏袒舊教的結果，終使由原本的教爭一變而為穆斯林一致反清的「聖戰」(註 13)

西北大亂，左宗棠奉命為陝甘總督，對於該一地區國防地位，「關係緊要」(註 14)，故於其人文地略早有研習，他深知關隴河湟谷地高原，地形複雜；甘涼新疆，沙漠戈壁，酷寒乾旱而遼闊寬遠，形勢迥異於中原，所以其思索用兵之計，「該以馬隊制步隊，更以車隊制馬隊，對於行蹤飄忽的捻還該多用火器」，於是「一面募練馬隊，一面就編組車隊。」(註 15) 然「南人用之西北，本非所宜」(註 16) 因南方軍隊調到西北作戰，「受不了寒凍，吃不慣麵飯，還有湖南勇丁歡喜隔幾時歸去一次，若到了西北，千萬里長路迢迢，不知幾時可回得家鄉」(註 17) 即使去了也「楚勇因秦地瘠苦，易於缺望，一軍叛亂，恐各軍效尤。」(註 18) 所以西去之部隊譁變屢有所聞，故曾國藩曾欲調鮑超靈軍赴援陝甘，但「鮑超遷延不至」，後來只好改派其得力部隊劉松山的老湘營，「時議遣援剿之師，因陝境殘破，諸將觀望，惟松山毅然自任，率師西行，曾國藩尤重之」(註 19)，故劉松山以「錦棠常為前鋒」(註 20) 率所部，「不辭艱苦，慷慨入關」至同治五年(1866)除夕夜抵西安，曾國藩為此密摺其「忠勇樸實，堪倚平寇」，從而使劉松山、劉錦棠的老湘軍成為當時左宗棠入陝(同治六年)進擊西捻犯陝、晉、冀、魯的清軍主力，並於日後，追隨左帥開展其叔侄在西北爭戰及劉錦棠經略新疆的一生功業。而劉松山、劉錦棠的此一部隊在西北因其「兵勇的堅忍性和主將精神感召」致「老湘軍出征新疆，雖是冰雪載途，裂膚斷指，還能挨受」，且他們對「老統領劉松山是畏服而又感服的」，即「便是松山陣亡後還常有一種心靈上的感應；對於少統領劉錦棠(字毅齋)也是衷心愛戴的，每當冬夜出防，雖在號寒呼凍之中，一見錦棠出巡，不覺歡欣鼓舞，頓如挾纊」(註 21) 渠不僅打破「南人不宜和不肯西征之說」的迷思外，後來松山、錦棠在「陝西北山剿平土寇時」收撫董福祥(字星五，甘肅固原人)，「就甘肅土著中募成三營都照楚軍編制，由福祥和張俊(字杰三，甘肅固原人)，李雙梁各帶一營，這就是『董字三營』隨同老湘軍平定甘肅，平定新疆，對於文襄公完成西征使命，實有重大的助力。」(註 22)

中原王朝的騎馬打戰技術自春秋戰國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後，儼然已成為古來西北征戰的必要手段，甚至隋唐以後，「騎兵在整個中世紀，一直是各國軍隊的主要兵種。」(註 23) 清季左宗棠初用兵東南，乃澤國之地，故馬隊需求，自不殷切，然而轉戰西北，對騎兵戰馬之需則實為當下之急。但其所憑藉兵源，因南人居多，慣於舟船之便，且又中原購徵馬匹不易，只得一面先找一位旗營馬隊兵官編練成一少部份，一面計劃從察哈爾購得戰馬，並由吉林獵戶中招募馬兵，以補充之，但因成效不彰，其兵源扣除「老弱和吸鴉片的」，與不習騎馬者，僅得「真正吉林獵戶只有四百多名」，而戰馬以「沿途餵養失宜，陸續病倒或死去」，到陝西，「只剩一千餘匹」，所以他「求人不如求己」而放棄「編練馬隊十營的計劃，勉強湊

成四營」(註 24), 雖總認為「以馬力言之, 西產不若北產之健; 以馬隊言之, 西北之人, 不若東北之雄」(註 25), 但由於當時條件的局限, 終究只得到西北後, 再就地取材, 陸續補充。當同治七年(1868)清軍平了西捻, 收撫陝北董福祥部三路西進陝甘之交, 攻下董志原十八大營, 陝回走依金積堡投靠馬化龍後, 左宗棠以劉松山、劉錦棠老湘軍為主力, 並配合中路清軍共擊之, 至次年(1869)八月中路軍由南而北剿辦, 在固原之抗清回軍中, 「固原回民毋仲元等被陝回白彥虎等所脅, 挈眷北徙金積堡, 陝回白彥虎及甘回李正榮等各股復由預望城、黑城子竄入固原州, 揣賊意在阻截官軍北行, 而以全力抗劉松山」(註 26), 適三百戶地方良回穆進善被白彥虎等所創, 俟清軍於初十日敗擊之, 並斬首陝回偽元帥楊文治(所用鐵矛重十七斤, 其悍可想), 至十二日又訊之生擒賊知, 所獲為陝回偽元帥李經舉之副, 「楊輝雲」, 並聲稱, 「李旺堡賊首李應春, 綽號野賊」已赴「預望城求援未回」而「金積堡馬化龍已屢為劉松山剿敗, 詭謀盡露, 且愧且悚, 不得不令各堡甘回迅速來援, 以掩其勾結之奸。馬化龍新教各回堡以預望城即禹王城、半角城即同心堡為最大, 諸回既受馬化龍指使就官軍求援, 陝回心更不安。於是陝回禹得彥、白彥虎、李經舉等之在預望城者, 潛率各部眾由鹽茶廳西竄, 約踞寧安、四百戶之崔三、馬生彥等部眾、金積堡所留之陝回陳林等, 悉數西趨, 圖由長流水、打拉城出會寧、安定一帶, 南合河州之回, 暫延喘息。」(註 27)十月初六, 雷正館、周蘭亭兩軍由四百戶進, 簡敬臨、張福齊駐韋州堡, 「與劉松山會商辦理。其甘回頭目馬化龍之黨馬萬春、馬中海、林應春等紛赴曾傅理處求援, 良回李百寬、丁化鵬、穆進善等則為官軍代購糧料, 遞送文卷, 惟恐弗及。臣節曾傅理一律安撫, 以昭分別。至陝回自鹽茶廳逃竄, 經官軍衝散后, 老弱婦女號啼四散, 凍餒難堪, 現經曾傅理飾各良回認保收養, 已不下萬數千口, 俟事定乃能分地安插也。」(註 28)而「回民王益萬報賊騎擾及半角城三十里之西陶家」, 為桂錫楨所敗, 「逆目明先行即明七十子」噉千餘騎, 「自固原東北之下馬關竄來, 圖截官軍糧道」(註 29)並被周紹濂所部擊退, 二十七日, 「魏光燾抵萌城, 已去慶陽四百一十里, 去環縣二百餘里, 時「回目羅復章, 馬柏森等出寨羅拜, 訴日前擾紅德城賊目系明七十子, 架名萌城, 實則萌城良回未預逆謀, 且願備馬械聽調遣。維時預望城已撫回目馬添發、黑城子把總馬文昭亦來, 具保萌城良回永無反復。魏光燾察其情詞真切, 慰諭之。率師由紅德城回慶陽忽接代理鎮原縣知縣廖溥明報, 明七十子一股又竄至固原東北, 噉元城子、三角城土回海生春、馬正榮、海滿和等出白家邨、關堡台, 故檄魏光燾自環縣而西, 丁賢發自固原而東, 兩路抄截。」(註 30)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魏光燾分營扼驛馬關, 會同留防各營偵緝殘匪, 自率馬步進白家邨。良回楊如雨迎候道側, 稱海生春數創之後, 懾伏兵威, 現距此不遠, 求准其收撫, 貸其一死。魏光燾即以楊如雨為嚮導, 派副將舒萬勝、都司范潮海單騎前往提海生春及其眷屬到營。訊系被明七十子逼脅入伙, 實非甘心從逆。魏光燾勒限悉繳馬械, 捆獻要犯贖罪。隨據海生春率同馬得中、剡文興、海滿和、海維江等款營待罪, 呈繳戰馬八十四、軍械六十件, 楊如雨亦具連坐甘結, 保其永不滋事。魏光燾比將海生春等交楊

如雨管押，以其餘眾八百餘口安置白家鄰附近地方，請示前來。臣查固原東山土回種落繁衍，門戶各別，回眾中自相推擇有總事，有頭目。北五營總事即楊如雨，丁有旺副之；東四營總事海生春，頭目則海滿和、海起舞、馬三科、海義泗也；南五營總事馬得中、剡文興二人。明先行即明七十子，馬正榮、馬興貴、毋仲元皆頭目也。楊如雨本屬良回。海生春、馬得中等向與毋仲元同居固原州城，上年八月內被陝回裹脅出城，逃竄元城子、三角城一帶。此次明先行劫眾跳梁，海生春等尚知及早歸順，情有可原。發去良民門牌交魏光壽轉給該降回，予其自新，以昭朝廷寬大之德。同時固原州城守營千總陸希正緝獲逆目馬歲兒子、海苟苟子各犯，由丁賢發派游擊黃義勝押解臣營，訊系糾黨在平涼安國鎮劫殺者，斬之。在逃之著名首惡明先行即明七十子、剡仲祿、海彥虎、海興和、海楊昌、海上玉、馬如意、明集成、馬占全、馬正榮等，仍勒限海生春捆獻。丁賢發陣擒在押之馬福有等五犯，已飭分別斬釋。」(註 31)十二月元日，「魏光壽、丁賢發馬步由固原鼓行而北」，八日夜，周紹濂所部分防黑城子、李旺堡，「王銘忠調良回馬相森馬隊為前導遇劫糧賊轉狂奔而來，異常悍鷙，馬柏森眾寡不敵，馬隊被賊衝散，陣亡回勇六名」(註 32)，因此對於助攻金積堡時，在固原投誠之回民，左宗棠以「陝甘各回麀聚金積堡，近因乏食，四出竄擾。臣前因固原鹽茶廳所屬東、西兩山，南界平涼，北界靈州，周數百里，回民居其大半，中間良匪雜糅，亟宜分別剿撫，以規久遠，遂擬設立旌善營，令已革壽春鎮總兵蘇如松督之，擇良回軍功馬柏森、穆進善、李百寬等為營官，各帶土著馬勇分起駐札，給以薪糧、馬干，隨官軍剿捕土匪、客匪。馬柏森本萌城回目。上年官兵由平涼掃蕩而北，固原州、黑城子、李旺堡、預望城等處回目經官軍剿敗，各挈其黨遁歸金積堡，蓋舊奉馬化龍為宗主者也。預望城地勢北接韋州堡，賊由金積堡南竄，必經韋州堡以達預望城，一過預望城則道路紛歧，防剿均費兵力。馬柏森者，本萌城良回，于時瞰預望城回目馬萬春投入金積堡，遂自萌城徙居之，斬通逆小回目而輸誠于官軍，截殺逆騎八十餘名。馬化龍、穆生花恨其背己，又以預望城為逆回南竄要路，必欲陷之，嗾馬正和率陝回，馬萬春、楊達娃率甘回，並圍預望城。」(註 33)此為繼「陝西良回軍功劉秉信，前于同治二年經陝西撫臣派其諭撫華涓逆回，被賊裹脅。上年(筆者按：同治九年)自拔來歸後，臣察其誠心就撫，人亦明白，節令安插平涼大岔溝一帶，是為陝回投誠之始，上年官軍圍攻金積時馬化龍嗾陝回環駐堡外，資其捍蔽而被圍日久，飢困異常，回民多思反正」(註 34)後，清軍在固原一帶大規模收撫之「良回」並為之始建旌善營旗以助清軍「剿逆」。其後，於同治九年(1870)底金積堡平定後，劉錦棠等除在寧靈一帶就撫各堡中，「將堡眾挑選精壯者千名，馬家灘挑選精壯者四百名，王洪堡挑選精壯者百餘名，及河生洲伙黨三百餘名，名為義勇，置之外濠空堡中，分交官軍就近鈴制」(註 35)，外接著又「分起押解陳林一起男婦大小一千五百六十四名口，馬振江一起男婦大小八百四十八名口，赫青選一起三百八十三名口，馬化鳳一起一千二百七十八名口」，及由河西「聞風而至，盡繳馬械乞撫」的「余彥祿、閻興春、余兆臨、拜萬江、金明堂、安杰等各起男婦大小五千五百五十餘名口」，

內挑出「壯丁四百名交安杰、藍明泰帶隨官軍征剿」(註36)盡「編入旌善營馬隊」。(註37)

在西北回民抗清中心金積堡陷落前，陝回白彥虎、崔偉、畢大才、禹得彥等，衝破清軍封鎖，由金積、海源、靖遠跨河西走廊於同治十年(1871)七月退往西寧駐大小南川與西寧土回，互為犄角，聯合抗清，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河州馬占鰲新坡路大勝後降清，使肅州馬文祿反清回軍暴露。在強大清軍壓力下，五月徐占彪率隊進攻肅州「馬四(即馬文祿)求援于西寧及關外各回族。」(註38)當時出扁都口的「崔三(筆者按：即崔偉)禹得彥等見擁三千餘人竄踞肅州之清水、臨水一帶」(註39)，而「畢大才等由大通赴肅州之援」(註40)，渠等眷口尚留大小南川，左宗棠為切斷河湟回民赴援肅州，以馬占鰲所部「將陝回去路遮絕」(註41)，並由劉錦棠老湘為主力急攻西寧，左宗棠料定「陝回家口均在大小南川，師指西寧，攻所必救，畢大才等或當回擾老巢。官軍力戰破之，然後分別剿撫，可速戎機」(註42)而採設法招降崔偉、禹得彥以孤立白彥虎策略，故早在劉錦棠清軍合圍前，即飾撫回陳林、閻興春等赴西寧與之議撫。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初八日，陳林等抵西寧，「始知崔三已帶其黨伙數千，九月內由扁都口一帶出竄肅州，口稱因肅回謀殺投誠，陝回馮均幅欲向其講理，尚未歸巢。陳林等比至大南川一帶察看情形，見陝回老幼婦女約數千人，所言皆同，聞陳林等至，無不喜其來而恨其晚也。陳林等因崔三等未歸，無從議撫，急欲言旋。該眷口等泣請暫留，恐此機一失，日後無路乞撫。各眷屬皆願雇人赴肅州送信，要崔三等迅速回巢。」(註43)不料未久，西寧馬桂源以「官軍激變」為由在「西寧府東關密與禹得彥、白彥虎、崔三等議抗官軍，後調各土回助亂。馬本源自稱統領河湟陝兵馬大元帥，桂源復往關外調集土回，盡領城中回兵回民以出，兩日不返」(註44)，故九月十三日，爆發西寧戰役，劉錦棠由碾伯向西分紮八十餘里，挺進西寧，而抗清回軍在小峽至平戎驛，向白彥虎部駐紅水溝、禹得彥、崔偉部駐小峽、馬營灣、三十里舖「恃險抗拒」，從九月下旬到十一月底兩個多月中，在不足四十里長戰線上與劉錦棠清軍血戰五十餘，「十月，劉錦棠潛師銜枚夜起襲小峽，回警覺拒戰，我軍已猿攀蟻附而上，奪南北兩山，於是官軍得小峽。」(註45)小峽戰役後，白彥虎經大通竄赴肅州，而於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劉錦棠入西寧，「西寧土回冶福興、馬福壽等及陝回崔三等皆款營投誠」(註46)，崔偉等在西北回民抗清窮途之末，為顧全「陝回之在西寧者，丁壯老弱婦女統計尚二萬為奇」，接受清軍之招撫，「崔偉、禹得彥，畢大才等傾心向化，劉錦棠挑其精壯，立為旌善馬隊」(註47)五旗，其眷屬被解「赴平涼、秦安、清水等縣擇地安插，一如化平故事。」(註48)至此由西北回民軍所組成的旌善馬隊擴充為五旗交由黃萬鵬管帶，編入劉錦棠軍營，接受劉錦棠直接指揮駐紮西寧而在之後的向陽堡、大通、肅州及河州南鄉閔殿臣復叛諸役的平定，甚至出關西征新疆驅逐外力與鞏固邊防中發揮重大的作用。

三、旌善馬隊在西征清軍中之作用

固原地區歷史悠久，它「地當中原農業區與邊疆草原區交接過渡地帶是中原北達朔方，西域之孔道，有『西塞之口』，『關中屏障』，『襟帶西涼，咽喉靈武』，『左控五原，右帶蘭會』之稱，歷朝視為軍事要地。」（註 49）故秦築長城，漢置蕭關，明為三邊總督封疆駐地，清代雖成為腹裡，但境內軍塞烽火遍布，為固原提督駐在地。同治元年（1862）陝西回民生事，即有固原回民起而響應，二年（1863）正月平涼回民穆生華攻入城垣占固原，三年（1864）四月清軍雷正綰在回民軍張保隆降歸下接收州城，固原回民軍北撤與金積馬化龍合，而陝回孫義保旋又攻陷，自稱「大漠鎮西王」，四年（1865）二月清軍圍固原，孫義保撤退黑城子，五年（1866），陝回白彥虎從董志原又佔固原。七年（1868）劉松山、劉錦棠在鎮靖堡降服董福祥編為董字三營及八年（1869）依左宗棠三路西進計劃，會攻陝甘回民軍圍逼金積堡，而於固原收撫良回馬柏森、穆進善、王益萬編為旌善三營後，展開以固原鹽茶為中心至金積堡一帶地區的掃蕩行動。中路軍周紹濂及管帶旌善三營的蘇如松於同治九年（1870）二月初偵知「西山李野賊、李存昇、李讀兒、馬百長、楊茂林等聚眾五六百人，蜂至馬螺掌、楊家溝、羅家腰嶮等處。初七日，提督周紹濂飭總兵張大雄、副將周玉林自李旺堡進剿，令回目馬益順為嚮導，黎明抵楊家溝。賊見官軍，即紛紛潰散。」十一日，「李野賊之黨楊滿林、馬宗祥股眾二百數十人，乘間竊發于西山，麇踞園圪塔、紅麻川。良回軍功王益萬自王家團飛報提督丁賢發，比派副將吳啟雲、守備張玉梁整隊馳剿。二十八日辰刻，王益萬引官軍圍園圪塔山下賊館」（註 50），官軍陣斬甚眾。三月初一日，「適良回穆進善率旌善營馬隊從碾子頭壓追而南」，十三日，良回楊如雨已將「逆回海滿寬縛獻軍前正法」，而「明七十子、單貴兩賊則隻身逃竄荒谷，黃鼎已飾楊如雨捕之」，左宗棠以東、西兩山，廣袤數百里，山谷盤亘，漢民少而回民多。其間良願守分回民雖復不少，而種族既繁，氣類亦別，良回每為匪回所劫持，難于自拔，馬化龍故得以其新教煽惑而勾結之。自官軍分駐中路，剿撫兼施，又錄用諸良回為之嚮導，誅其莠而宥其良，腹地伏莽乃漸有肅清之望。雖陝甘逆回或由金積南來，或由陝境北竄，而諸營聯絡布置，地網四張，良回復為偵探導引，每得掩其不備而殲之。」（註 51）故所有此次截剿金積南竄陝甘各回，殲除首逆，最為出力者，官軍中除周紹濂外，督帶旌善馬隊的已革安徽壽春鎮總兵蘇如松也「請旨開復原官，留于甘肅補用」，而「出力回目軍功馬柏森、穆進善、李百寬、王益萬等，確偵賊蹤，導引官軍克獲全勝，助剿殺賊，勞績卓著，本應隨摺請狀，因從前迭經領兵大員賞給功牌職銜，均未敘奏，容俟查明核奏，請旨破格優獎，以示激勸。」（註 52）其間，雖有「提督丁賢發，因催解馱驟激變被戕」，左宗棠以「記名提督丁賢發，督帶宣威軍駐札靈州屬之韋州堡，紀律不嚴，弁勇時多滋擾，屢經臣嚴檄申飭，并以危詞儆之。該提督所部本多江淮降人，勇于戰鬥，而習氣已深，丁賢發恃勇而輕，不知鈴束。九月初間，丁賢發帶隨身小隊赴預望城，因催辦運糧馱驟，與預望城回目馬添發

爭辨，盛詞詆責。正紛呶間，馬添發喉所管回眾與所部小隊搏鬥，丁賢發拔刀而前，斫傷數人，觀者蜂起，登將丁賢發刺斃，而隨行之副將楊正華、守備周炳南、黃占標等亦以趨救丁賢發，均受重創斃命。先是，萌城回目馬柏森，經臣委帶旌善營馬隊駐預望城，歸提督周紹濂統領。當馬添發等與丁賢發鬥殺時，馬柏森倉卒馳往彈壓，事已無及。而馬柏森所部馬勇楊進海、白有義、楊進科、楊春壯、關漢英、丁明有等，又均馬添發親友及其舊管回民，馬柏森無如之何，旋帶其親信馬勇數名逸出。馬添發既害丁賢發等，欲勾馬柏森同變，並戕其幕友典史黃元芳、附生馬獻瑞以脅之，而東山一帶零回多聞風響應。臣據馬柏森及統領楚軍中路提督周紹濂，統領奇營副四旗馬隊提督張會元等前來，當經飭令周紹濂差弁赴預望城相機察辦，檄令張會元暫行接統宣威軍，并派副將李瑞林前往清點歸并為之管帶，又諭令馬柏森迅速設法縛馬添發、楊進海等以獻。維時東山各回有圖逼馬柏森以助逆者，有假旌善營號衣以劫擾糧道者。適陝回丁步月等由金積南竄，亦思踞預望為巢穴。馬柏森所部馬勇馬彥龍等亦多被勾煽。馬柏森潛告周紹濂預為之備，一面收集部眾，計擒馬添發等解交周紹濂，並斬羅山、郭家窰匪黨數十名，捕獲譚家堡逆目譚生邦及馬忠海死黨丁萬圖、馬三保等解周紹濂營及臣營，訊實斬決。將丁賢發等屍骸禮殯送至鞏州。兩月以來，固原以北運道仍臻安謐。臣維提督丁賢發因催辦駢騾過於苛急，激成此變，自可毋庸議恤。至副將楊正華，守備周炳南、黃占標，千總陳騰甲，把總張世發、李全忠、劉學明，典史黃元芳，生員馬獻瑞等，倉卒遇難，情實可憫。合無仰懇天恩，敕部議給恤典，以慰幽魂。都司銜馬柏森，帶勇駐札預望城，於丁賢發等之死救援不及，而罪人既獲正刑誅，叛卒亦均就殲滅，功過尚足相抵，應免置議。」（註 53）而同治十年（1871）正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更奏稱「固原北至金積，路出東、西兩山之中。兩山綿亘數百里，最為藏奸淵藪。自進兵以後，雖節節掃蕩，步步立營，然徑路分歧，山谷盤亘，零匪伏匿其中，乘間劫殺，時所不免。自應挑土著回民作為眼線，探知頭目蹤跡，迅起掩之，乃期得手。迭据記名提督周紹濂稟報，所部左營管帶官總兵李良穆，派弁李昭林及回目馬益順、王益萬、李存升，於上年十月二十九日，在羅家要險地方追剿回逆獲勝，生擒逆目王金玉；管帶旌善頭營都司銜馬柏森，在羅山坡一帶剿賊獲勝，生擒西山要逆譚生邦、丁萬圖、馬三保三犯。臣查譚生邦即金積堡巨逆譚生成之弟，王金玉、丁萬圖即正法馬忠海之伙也，批飭解營訊決。東山賊目李映春即野賊，明起成即明七十子，兩犯系馬化龍死黨，李映春為李旺堡逆目，偽號元帥，明起成偽號先行，前於各中曾詳陳之。該逆屢經官軍擊敗，黨伙散盡，而賊首不獲，終虞死灰復燃。適撫回陳聚安探報，李映春、明起成現匿張家川之瓦窰堡。當飭陳聚安會同軍功李德昌密速掩捕，明起成就獲，而李映春先遁。旋据管帶中路左營總兵李良穆報稱，十二月十二日，派弁同回目李存昇、馬益順捕得李映春之黨楊大山等數名，訊知李映春竄至東山，即令楊大山等引導，前往掩捕。十四日，生擒李映春及其子李存英，遂提明起成及該犯父子一并斬梟。据統領武威軍署平慶涇道魏光燾報，良回馬宗保捕獲南八坊逆目馬海奇、馬俊，并生擒逆回馬舍娃子三犯。又署鹽茶廳照

磨董麟，會同管帶旌善二營良回穆進善稟，獲逆日馬俊，綽號紅套褲一犯，訊明斬梟。又据周紹濂報稱，十二月初十日，李存升拿解要逆楊大娃子。查楊大娃子于同治三年穆生花襲陷固原州城時，曾帶萬餘人偽號順天王，上年隨同馬正積圍攻預望堡，馬正和為官軍擊斃，該逆仍與明七子合伙肆行劫掠。當即斬決梟示。据馬柏森報，捕獲王花台逆賊馬義等十九犯，謝家段頭賊目偽元帥王添發及其黨王成幅、王虎子、台馬四等四要犯，批令解營訊決。据管帶西征馬隊參將楊正茂報，十二月十三日，由馬營監護送運省餉項、軍火，十四日，探得距麻子川十餘里景家口有賊，揮隊奮擊，斃步賊百餘名，生擒十餘名，逆日袁和合已斃於陣。此東、西兩山及會寧、安定捕斬要逆多名實在情形也。」(註 54)由於「平涼府屬鹽茶廳、固原州所轄東、西兩山，界連寧夏、鞏昌、慶陽、涇州各府州地，周千餘里，岩壑復沓，漢回雜處，最為藏奸淵藪，清軍雖「窮搜遍緝，以護餉運而靖地方，擒斬首要各匪」，而卻「賊計愈狡，往往寄孳于河州各賊巢，勾結外匪，每起數百騎或數十騎，剿掠兩山間，見官軍至則避匿無蹤，兵退復出，倏東倏西，飄忽狎至與北方馬賊梟匪同。而此間地廣人稀，山各盤亘，驅除尤為不易」，二月初三日，据署平慶道魏光燾報稱，其「所部前營副將魏紀鑿，剿馬鬻子股匪于紅羊坊一帶，陣斬六十餘名」，其「逆首馬鬻子已帶重傷，伏鞍竄匿」，又「記名提督周紹濂派隊攻羅山、謝家段頭各賊巢，斬賊數十名，生擒十餘名，內有偽元帥袁希孟、王添發兩名，皆金積未破之先，馬化龍遣其出外求援未及歸巢者。袁希孟即閻希孟，凶悍尤著，曾為馬化龍守峽口以抗官軍者也。東山北段以預望堡地勢最為險要，向為回日馬添發所踞。馬添發伏誅后，旌善營營官、都司銜馬柏森收用其伙馬彥隆、李萬海。嗣因其不服調遣，革逐之。馬彥隆、李萬海心懷缺望，三月初七夜刺殺馬柏森，脅其黨以叛。周紹濂、魏光燾聞變，率隊圍剿。賊知大兵將至，向毛居士井、元城子一帶紛竄。魏光燾派總兵于奇泮、副將蕭玉元追之，遇賊下馬關，陣斬騎賊七十餘名，生擒五名。副將魏紀鑿追至元城子地方，斬步賊十餘名。提督徐文秀自白家畝追至」，「馬彥隆、李萬海遂遠竄西山深處百草原、中灘一帶，踞險為巢，與西山要逆馬鬻子、李百寬、馬才棕相勾結。李百寬者，鹽茶廳屬賀家堡回目，舊與逆回馬忠海通。馬忠海伏誅后，李百寬與其弟李百申、李文虎藏留馬忠海餘黨柳文魁、楊保祿及馬化龍之戚屬田如貴。懼官軍搜捕，伙謀竄附沙州賊巢」。十二日，魏光燾飭所部前營副將魏紀鑿搜捕雅牙兒灣一帶匪徒，適逆日馬彥隆由關門山竄至，擊敗之。賊折由鹽土溝一路東竄，良回都司銜穆進善率旌善二起馬隊拒之，少卻，收駐南窯洞。賊仍東竄，穆進善馳報魏紀鑿，出官馬套截剿。直至四月十六日始「將李百寬、李文虎眷屬奪獲。」(註 55)而所有此次搜剿最力除魏紀鑿外，為旌善馬隊，「都司銜穆進善、王益萬」，「其本系良回，從征備勉，斬賊甚多，應請以都司補用，並賞加游擊銜。」(註 56)至於「其西北游匪」，在五月二十日，周紹濂則仍以「王益萬之馬隊搜山至駝廠堡，小有斬獲」，至六月一日始捕獲馬化龍戚屬田如貴，致使「六月初二日，賊目馬彥隆所裹良回楊保俊，手刃首戕馬柏森之賊馬成禮，並帶回馬勇十八名，赴總兵于奇泮營前乞撫，受之。」(註 57)而「穆進善，王益萬

本屬回民，既知自拔來歸，復導引官軍擒斬要逆，經臣委帶旌善營馬隊，戰功卓著，勞績最優，故獲左宗棠奏旨逾格鴻施具陳。至此關隴間游回漸平，而「陝北逆蹤剷除殆盡，僅餘漏網之羅三朝、馬正榮各零股數十騎，此擊彼竄，飄忽異常」，致使管帶武威前營總兵魏紀鑿，因同治十一年（1872），「七日內迭據撫回馬義才堅稱，伊侄馬正榮急于求撫，心懷疑懼請前往收撫等情。魏紀鑿即率弁勇數名帶同馬義才及撫回陝榮前往。七月三十日，行經定邊四合原地方，適遇羅三朝、馬正榮等合股竄至。魏紀鑿推誠研導，羅三朝見魏紀鑿隨身并無隊伍，頓起殺機。魏紀鑿知賊情有變，即挺矛擊刺，格斃數賊，究因眾寡不敵，力竭陣亡，弁將楊石泰等亦同時戰歿。羅三朝以撫回陝得榮為同教，甘言誘之，陝得榮大罵不屈，旋即被害。嗣陝西提臣雷正綰派隊兜剿東山零匪，生擒羅三朝及其死黨馬海受、馬海明三犯，解交平慶涇道魏光燾驗訊明確懲處，臣飭魏光燾並提給稱求撫之馬義才一犯，均訊明確誅，以雪忠憤。竊惟魏紀鑿素稱驍勇，深明戰略。同治六年隨臣入關，委帶中營馬隊。隨征陝西雲岩鎮、董志原等處，歷著戰功。復攻克保安縣屬老岩窩，擒斬首逆袁大魁。嗣委帶武威前營，剿賊環、慶兩川及韓、蒲、郃、高等處，肅清鹽、固兩山游匪，生擒逆首李百寬等多名，厥功尤偉。茲以零匪求撫，急于見功，致被戕害，實堪憫惜！」（註 58）除請准將其照總兵陣亡例賜恤外，則固原鹽茶、平涼、慶陽間「游匪逆回」之大定，馬柏森、穆進善、王益萬等三營旌善馬隊，功不可沒。

西寧之役後，左宗棠以「迨安撫漸多，來投者，亦請速誅反側，自明心跡，而後，因而用之，庶收以回攻回之效」（註 59），所以，「陝回之在西寧者丁壯老弱婦女統計尚二萬有奇，崔得彥、畢大才等傾心向化，劉錦棠挑其精壯立為旌善馬隊。」（註 60）而馬桂源東竄巴燕戎格後，仍聯絡向陽堡、大通（在西寧西北）下亂泉等回首繼續抗清，故劉錦棠對西寧之役的撫降回眾，「推誠相待，群為感動，陝回中如崔偉、畢大才、禹中海，土回中如冶復興、馬福壽即江湖三、楊保元者外，各回目悉矢志輸誠，人心漸定。惟大通縣地居邊徼，未睹軍威，向陽堡逆回馬進祿、下亂泉逆目韓起壽即半角頭，本屬叛員馬桂源、馬本源之腹心，大通營都司馬壽，尤為狡黠」，加上「撫回崔偉、畢大才、禹中海等願剿賊自效」，所以於同治十一年（1872）十二月初六大通回民軍在馬壽、馬進祿、韓起壽領導下在向陽堡重新起事，並迅速攻克大通，十二年（1873）正月初一日「悍賊千餘撲崔偉等營盤，崔偉等率馬隊擊走之，追殺十餘里」，並「訊出叛弁馬壽之侄，賊目馬良才斬之」（註 61）至四日，劉錦棠、余虎恩、董福祥等，攻克拒守向陽堡馬壽、馬進祿、韓起壽，而崔偉等「旌善馬隊向陽堡之役助剿尤異常出力」，惟白虎「自知罪孽重大，慮不為官軍所容雖亦偽詞乞撫」，但「責其呈繳馬械則遷延支展觀望不前，崔偉等亦陰告劉錦棠預為之備。」（註 62）初八日「撫回冶復興、馬福壽由通城馳至」，知「惟叛弁馬壽之黨千長馬長忠、韓善文、王成宗，偽軍師袁滿拉等及其死黨仍誓死抗拒，餘皆畏兵威並無固志，劉錦棠飾董福祥守向陽堡親率各營傳馬壽從行」至城邊，「劉錦棠麾軍環攻，令冶復興馬福壽繞城而呼，『獻城迎降者免死擒賊者重賞』。」（註 63）

如此由六日至九日，經過激烈巷戰亦攻陷大通。

河西回民起事，早在同治二年（1863）二月，回民馬宗海為響應陝西及甘肅東部穆斯林的抗清，曾在肅州祕密活動，奈因事機敗漏，「肅州知事徐啟擒誅七人，事寢」（《肅州新志》卷七），迄四年（1865）正月，涼州回民馬忠應在東關策動清軍中之回族米殿策反，致釀成殿策全家闔門自焚不從，而激戰三晝夜後失敗，但卻揭開河西回民起事序幕。而肅州古城自西漢「列四郡据兩關」以後，歷來即為西北邊防重地，為通西域門戶的兵家必爭之地。清同治年間陝西、金積、河州、西寧各地回民反清失敗後据肅州的馬文祿，儼然是陝甘回民抗清的最後堡壘。其間雖曾與成祿撫議，但陽奉陰違，時時「復叛」，尤其自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白彥虎由青海大通而來，便與之分兵攻清軍，「白彥虎二千餘眾由永安趨肅州，盤踞城外塔爾灣，馬四（筆者按：即馬文祿）攻官軍長壕以應之。」（註 64）為此左宗棠早於同治十年（1871）馬文祿「復叛」，成祿避之高台時，即於七月飾徐占彪馬步十二營先行部隊赴肅州，十二月再調金順由寧夏西進，十二年（1873）五月又派宋慶「赴肅州與金順、徐占彪會剿」（註 65），同時以鄧增炮隊助攻，奈因肅州城明代時即已「全部青磚包砌」，從此「酒泉城成為明代西北邊塞上第一座雄偉高大的堅固城池。」（註 66）至清季，其城池之堅固，仍「城高三丈六尺，厚三丈有奇，外環深濠深二丈有奇，闊可十丈」（註 67），且濠外另置堡壘，分設卡隘，固若金湯，儘管雖只「孤城僅存」而敵人亦「攻堅究無善策」，且馬文祿亦向烏魯木齊妥明求援，故官軍久攻不克，迄近一年中，均未能得手，所以左宗棠乃於八月十二日抵肅州，親自督師，而「劉錦棠在西寧聞節帥親赴前敵，率隊取道永安赴甘州候調，稟報至肅，左師帶數營前來助剿。」（註 68）所以劉錦棠於九月十日率湘軍五營及已撫回番至肅州，駐南門，「毅齋日昨率馬步三千餘前來周視重濠，亦謂無隙可乘」（註 69），但他詳審形勢，並遣余虎恩逼城立壘後，向左宗棠提出「心戰與兵戰結合」（註 70）的看法說，「得城反掌耳，然不可以力取，吾將不戰而屈之，既退，呼崔偉曰：若虜許吾頭，吾欲令若單騎說馬文祿，言未卒，崔偉唯唯，錦棠諭以朝廷威德，不聽當速決戰，因勒兵以待」（註 71），因此令「陝回軍功崔偉、禹中海，畢大才，甘回軍功法鏡泉、馬福壽等日馳馬城下，呼馬四及各賊目告以死期已至，善自為謀，馬四自知生路已絕，哀懇出城乞撫。」（註 72）而「肅州城破標誌著陝甘回民起義的最後失敗。」（註 73）至此歷時十二年之久的陝甘回民反清事件，基本上被平定。然不料同治十二年（1874）十一月，河州撫回閔殿臣以南鄉復叛雖清軍河州鎮總兵沈玉遂急往鎮壓，但在三十里鋪地方被閔殿臣設伏敗之，沈玉遂乃向左宗棠「稟請調兵會剿」，故左宗棠「調三品卿銜署西寧道劉錦棠帶所部九營旗隊，向西寧出大何家口，由河州西北入，會督各營，直搗南鄉賊巢，克期蕝事。」（註 74）十二月初二日劉錦棠在河州城外二十里鋪一戰，「令黃萬鵬督旌善馬隊崔偉、禹偉彥、畢大才等四百騎」，協老湘軍及河州撫回馬占鰲、馬永瑞助攻，「旌善馬隊張兩翼挾抄迅進，以其半下馬開槍，立斃悍賊二十餘名，賊鼠竄歸巢。」（註 75）尤其初九日的姚家嶺一段，清軍提督「黃萬鵬令旌善及河鎮各馬隊由山梁下馬開槍

轟擊，賊棄馬下山向買家集、郭家嘴等處狂奔。」(註 76) 於西寧受撫後，英勇善戰的旌善五旗馬隊，在具組織才幹的崔偉等所領導下接受劉錦棠的指揮，配合擅長山谷作戰的老湘軍在向陽堡、大通展現了西北馬隊的特長，肅州之役又發揮其貞毅勸降的心戰效果，尤其河州南鄉閔殿臣之役更顯露了他們驍勇忠誠的一面，其對陝甘大亂的綏定是具關鍵性作用的。

新疆，古為雍州外域，為漢以後所稱「西域」的主要部分，因其處亞州腹地，居東西世界之中心，自來即為歐亞陸路交通孔道，地理位置重要，而到清代中國，乾隆中衰，嘉道以還，軍政敗壞，邊務廢弛，早已「回亂不斷」，加又英俄東來，南北交侵，同光時，已淪為列強爭逐蠶食對象。同治三年(1864)，浩罕軍官阿古柏(Yakoob)趁新疆大亂，挾張格爾子布素魯克(Buzuruq)而入侵，並勾結英俄，致使新疆幾成異域。同治十年(1871)蘇俄更悍然入踞伊犁，故左宗棠於塞海防之爭後，在光緒元年(1875)被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二年(1876)四月他進駐肅州，以劉錦棠為前敵總司令，由老湘軍加上接受其直轄的西北董福祥甘軍與回民旌善馬隊為主力，率同都統金順，提督徐占彪、張曜等清軍入新疆進行收復並抗拒外力入侵之戰。是時新疆除俄占伊犁及清軍尚保有東疆巴里坤至哈密一線外，基本上均已淪為阿古柏所有，而陝回白彥虎亦西投阿古柏繼續抗清，左宗棠擬定由北而南、緩進急攻策略後，所有前線作戰均交由劉錦棠總理，不為遙制。光緒二年(1876)六月，「劉錦棠會金順于阜康，議當先攻古牧，撤賊藩籬。」(註 77)六月駐軍阜康城東九營街，擬「以金順軍北路、而南路則錦棠任之」(註 78)，計欲南北兩路向古牧地、烏魯木齊推進，而當時阿古柏以馬人得守烏垣，馬明守古牧地，白彥虎原駐紅廟子，後因古牧地乃烏魯木齊外圍，是與清軍會戰的前沿所在，更調白彥虎入駐黃田，以便與烏垣互為聲援。而劉錦棠採「引水誘敵」的聲東擊西策略，「潛師夜起，會金順所部」，神不知鬼不覺情況下，由小路「進襲黃田」，拉開了古牧地之戰的帷幕，並以余虎恩之湘軍騎兵及黃萬鵬所率旌善馬隊左右兩翼進攻，自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經黃田、黑溝驛激戰而打下了輯懷城及由烏魯木齊派來應援的回軍，取得入新疆紀首次勝利，同時拾獲回軍「回、漢文各一通，關係王治、金中萬等被困，求救於烏城逆首阿奇木者」，並知「烏城精壯已悉數遣來，現在三城防守乏人，南疆之兵，不能速至，爾等可守則守，否則退回烏城，並力固守亦可。」(註 79)所以劉錦棠「以古牧地既克，烏垣逆賊必聞風膽落，乘勝直搗，一鼓可下」(註 80)，因此於二十九日仍以余虎恩騎兵及黃萬鵬所率旌善馬隊左右先發，「黃萬鵬、崔偉、畢大才、禹益長、馬正國、禹中海率馬隊五旗由右路追擊」(註 81)，步隊繼之，如此劉錦棠踞高於烏魯木齊紅山六道灣東梁架炮，「一炮成功」的於「三日之內連下四城」(註 82)，使馬人得、白彥虎等棄城抱頭鼠竄，南逃達坂城，並於九月二十一日分兵助金順久攻不下的瑪納斯南城。至此，歷時三月使新疆北路除伊犁地區外已完全掌握在清軍手中，其中，崔偉所率旌善五旗馬隊作為劉錦棠的直轄部隊，馳騁疆場，衝鋒陷陣，「攻剿古牧地、烏魯木齊、迪化州、瑪納斯等處，所向克捷」(註 83)的表現，實居功厥偉。

北疆收復，已「時屆嚴冬」大雪封山，「嚴寒臨陣，非其所宜」，所以劉錦棠，「意決俟明年春融進兵。」(註 84)故在烏魯木齊整補後，於次年春，始以徐占彪、張曜軍「自東而西」攻吐魯番，而劉錦棠則「自烏魯木齊逾嶺而南。」(註 85)時「阿柏懼大軍不日進討，迫使白彥虎與馬人得守吐魯番，拒哈密密軍；使大通哈(筆者按：即大總管)守達坂城，拒烏城之軍；使次子海古拉守托克遜，而自踞喀喇沙爾策應。」(註 86)如此在阿古柏所有精銳盡出，尤其達坂一城重兵以待下，劉錦棠所部於三月三日抵柴窩鋪，是日黃昏，派余虎恩陶生林、夏辛酉與黃萬鵬、崔偉、畢大才、禹益長、禹中海步馬隊及譚上連等步隊於「初鼓銜枚疾走」，期以「五鼓會集城下」。馬隊陣列城左山崗，步隊陣列城後山崗，「黃萬鵬、崔偉、畢大才、馬正國、禹中海等各以馬隊環聯兩軍而陣。」(註 87)海古拉見官軍攻達坂，急令騎兵五、六百餘由托克遜馳援，卻遭崔偉、陶生林、夏辛酉等痛擊而退，清軍大舉攻城，初六日，炮中「城中子藥房」，又值「大風驟起，火焰更張」，「賊中人馬碎裂，遺骸堆積。」(註 88)，達坂城遂克，劉錦棠對「其就縛之南八城各回、土爾扈特種人及土回等，則均給以衣糧，縱令各歸原部」，且「各賊回于喪膽之餘，懷不殺之德，皆驚喜過望，踴躍歡呼而去」(註 89)，劉錦棠的此一欲擒故縱，收買人心做法，對瓦解敵軍士氣起了重要作用，誠如庫羅帕特金，《喀什噶爾》一書所說：「中國軍隊的長官劉錦棠對待在達坂城抓獲的俘虜特別講究策略，這對於中國的影響是極為有利的。」(註 90)劉錦棠於安撫百姓，遣散被俘裹脅民眾，恢復城中秩序及生產並分兵駐守後，「錦棠遣羅長佑以馬步六營趨吐魯番會攻，而自帥十四營由西南直搗托克遜。」(註 91)十三日他飾黃萬鵬率旌善馬隊急進，「忽馬步賊隊從路旁空莊衝出，將官軍前後包圍，勢殊猖獗。黃萬鵬、崔偉、畢大才、禹益長、禹中海、李金良縱橫衝殺」，適「劉錦棠率馬步大隊馳至」，因此以三路長驅而進，「黃萬鵬等復從內殺出，賊屍遍野，餘賊紛竄」立克托克遜，而「海古拉、白彥虎于十二日各帶隨身騎賊」，護輕重「倉惶西竄」。羅長佑等「十三四寅刻齊抵吐魯番，適張曜、徐占彪兩軍同日從東路馳至，遂會克滿漢兩城，安集延所置阿奇木馬人得詣軍前乞降，回眾萬餘跪地求撫，羅長佑等受之，吐魯番全境蕩平。」(註 92)達坂、吐魯番、托克遜三城收復，使「南路門戶洞開，帕夏阿古柏如斷左右臂，又以釋回搖動眾心，阿古柏要殺數百人，于是群回憤憾，日夜望湘軍至。阿古柏自知人叛天亡，旦夕就俘，四月于庫爾勒仰藥死，次子海古拉昇屍西走。」(註 93)而旌善馬隊亦隨劉錦棠部繼續西進，「取道烏沙塔拉，傍博斯騰淖爾西行，出庫爾勒之背為奇兵」，直搗喀喇沙爾，因白彥虎「壅開都河水以阻官軍」，河水漫流泛濫，乃「傳令將士晷水經過」，於光緒三年(1877)九月十一日「令黃萬鵬、崔偉、畢大才、禹中海、禹益長、李金良、馬殿林率旌善馬隊」(註 94)與譚拔萃等左右攻庫車至十二日始克，如此「冒寒遠征，一月馳三千餘里」(註 95)追殲阿古柏殘餘勢力，相繼收復阿克蘇、烏什等城。旌善馬隊作為劉錦棠的先遣部步，崔偉等也因「險陣摧鋒，出奇制勝」被「劉統帥賴為裨師」(註 96)官至清軍「總兵」(註 97)一職。

劉錦棠在「未及三旬，連行四城」，左宗棠盛讚其「兵機神速，古近實罕見其比」(註 98)，

雖其所派崔偉旌善馬隊在烏什追殲白彥虎未果，「深以白逆漏逸，引為己咎」，但左宗棠仍不責怪，而以「連復四城實劉錦棠及所部將士之力，有功必賞，古之常經」，荐其「應請開缺以三品京卿候補。」(註 99)東四城收復劉錦棠本欲就地整補並待張曜部隊到來，再直搗喀什噶爾等西四城，未料局勢遽變，因喀什噶爾何步雲等「急求反正」並知「白彥虎九月底竄至喀什噶爾東北面八十里」地方，而「留踞喀什噶爾頭目阿里達什拒白彥虎不納，何步雲、英韶率滿、漢兵民數百人佔據漢城，乞發兵救援」，旋又被阿里達什「逐日攻撲，並聞伯克胡里准白彥虎入喀什噶爾助攻漢城之信」(註 100)，值此喀城告急，劉錦棠以為機不可失，遂以余虎恩由阿克蘇取道巴爾楚克、瑪納巴什為正兵，飾「黃萬鵬率旌善馬隊」，「由烏什取道布魯特邊界，為奇兵」(註 101)，而自親率所部進瑪納爾巴什徑搗葉爾羌、英吉沙爾，並飾董福祥分兵和闐，如此三路取迅雷下擊之勢，至十一月十三日收復了淪陷十三年的喀什噶爾。而伯克胡里於縱火燒城後倉惶西逃，清軍於十四日拂曉派馬隊自捷徑追擊，步隊繼之，在喀什西約五十餘公里的明約路一仗，旌善馬隊與老湘軍打了一場出色的殲滅戰，「除了匪首阿古柏的長子伯克胡里和陝甘回民起義的叛徒白彥虎事先與俄國秘密勾結，得到老沙皇派兵接應，因而得以遁逃俄境，保住狗命外，中國軍民奮威截擊，包圍聚殲和搜捕擒獲了其全部敵人，徹底摧毀了外國侵略者在中國土地上建立的『哲德沙爾』(七城)反動政權，挫敗了俄英侵略新疆，特別是俄國妄圖通過阿古柏獨佔新疆，肢解我國的計劃，取得了我國近代史上—場反侵略的民族保衛戰的光輝勝利。」(註 102)迄二十九日，西四城全數收復。至此新疆除伊犁外為俄人所踞外，全疆抵定。

光緒四年(1878)為伊犁還返，清廷派崇厚赴俄交涉，未料五年(1879)八月十七日，崇厚卻與沙俄簽下喪權辱國的《里發第亞(Livadia)條約》，割去霍爾果斯河西，特克斯河流域大片土地，「從而隔斷了伊犁與南疆阿克蘇等城的聯繫。」(註 103)至令全國譁然，「無不以一戰為快」，此時在新疆前線的劉錦棠更認為「非決之戰陣，別無善策」(註 104)，因此清廷於光緒六年(1880)，致函沙俄改派曾紀澤赴俄交涉，同時命左宗棠作好打仗準備，二月，左宗棠採分兵三路出擊，東路以金順主之，中路由張曜主之，西路則由素為「布策輩所忌老湘軍」(註 105)的劉錦棠取道烏什由冰嶺之西經布魯特游牧地而攻伊犁。而他自己以六十九歲高齡由肅州向哈密「舁櫬以行」(註 106)表明其驅俄收復古土的決心。並「令諸將嚴備，在在不露戰跡，時時不忘戰心，蓄養精銳，靜以觀變。」(註 107)由於左宗棠、劉錦棠的備戰，予曾紀澤與沙俄談判起了很大的後盾作用，終使沙俄即將得手之獵物掏出，而於光緒七年(1881)正月，簽下了改定《中俄伊犁條約》，使伊犁重回祖國懷抱，其中左宗棠、劉錦棠等所起的作用自不在話下，而旌善馬隊「崔偉等三路重兵駐防新疆，時刻備戰，嚴陣以待，以強大的軍事與實力作後盾，其舉措有力地配合了曾紀澤與俄方的談判，為伊犁回歸祖國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註 108)

四、旌善馬隊的功過爭辯

西北的旌善馬隊，在左宗棠中原、東北籌組馬隊不得下，於同治九年(1870)二月西征陝甘時，收固原地區良回始立為旌善三營，由馬柏森、穆進善、王益萬分領而令總兵蘇如松管帶，同年底，金積堡平定後，在寧靈收撫「良回」，挑精壯為義勇，交官軍就近鈴制。其後，又將陳林、馬振江、赫青選、馬化鳳及由河西聞風而至的余彥祿，闡春興、安杰等挑出「壯丁四百名交安杰、藍明泰帶隨官軍征剿」盡「編入旌善營馬隊」。為隴東寧靈「匪回」平定立下汗馬功勞。尤其同治十三年(1874)西寧之役後所收崔偉、禹得彥、畢大才等立為旌善五旗馬隊，隨劉錦棠作戰，對向陽、大通、河州南鄉閔殿臣及肅州各役之平定戰功卓著。出關新疆後作為「五大親兵馬隊」(註 109)，委由「黃萬鵬率旌善馬隊五旗」(註 110)追隨劉錦棠與老湘一軍並肩出擊古牧地，烏魯木齊、瑪納斯，而後入南疆達坂、托克遜之攻堅，在「未及三旬速復四城」下，把握有利時機「披荊斬棘，穿越絕塞霜雪中，登石壁冰梯」分三路直逼西四城，補「官軍多南人，不耐冰雪冬令」(註 111)之不足，故能「克復四城，未逾一月，廓清二千數百里，斬獲極多」。而在新疆追擊白彥虎這一左宗棠多次指示「專注白逆」的首要份子未果，就連身為前敵總指揮的劉錦棠，都「深以白逆漏逸，引為已咎。」(註 112)下，其間，黃萬鵬所率旌善馬隊正是接受左宗棠、劉錦棠於光緒三年(1877)九月指「令旌善五營專追白逆」任務者。故有學者，因之謂旌善馬隊「網開一面縱白彥虎出走」及「軍中謂白賊之不獲，由回兵走泄軍機」之「貽誤戰機」與「通風報信」(註 113)的說法。

陝回白彥虎關隴起事後，經董志原、金積、西寧一路與清軍對抗，至肅州馬文祿敗亡後，又出關新疆，為左宗棠指稱必殲之回首，他多傳令「如置白逆竄近，即行戮剿，務令罪人斯得，以竟全功。」(註 114)官軍入南疆時又節劉錦棠，「率馬步各軍並力痛剿，能就阿克蘇、烏什了結此支窮寇，則南疆大局已有幾分，應否懸立重賞，分別剿撫，設法誘擒，務令罪人斯得，以竟全功」(註 115)，所以劉錦棠入新疆後亦以擒殲白彥虎為要務。而白彥虎出關入新疆。取道烏魯木齊，「北渡遐荒」受阻於已踞綏來(瑪納斯)的徐學功民團，所以「結安」阿古柏，「他同安集延的關係算不上涇渭分明，他同清軍的對抗又客觀上分散了清軍的精力，使安集延偽政權得以苟延殘喘」，當然白彥虎在新疆與阿古柏之勾結是「鑄成歷史性的大錯」(註 116)，清廷也因此一再降旨，「白彥虎系著名首惡，斷不可任其漏網」，而劉錦棠以崔偉等的旌善隊在河湟忠誠的表現，一再專任其追擒白彥虎。左宗棠更「籌思至再，欲以回制回」，令旌善馬隊，「從白彥虎所經之路，星夜尾追，將出發，宗棠反覆叮嚀曰：爾等此行負的責任很大，打得老虎回，高官厚祿，吾決不汝吝，倘通同一氣，縱虎歸山，提頭來見，僉曰宮寶萬安，沐恩等，不敢。」(註 117)因此，儘有稱回族「老人的口歌說：旌善馬隊追的白彥虎，越追越遠了。」(註 118)的說法及光緒三年(1877)九月，「謀報白彥虎竄烏什，噶安集延走葉爾羌，牽綴追師。錦棠於是舍安集延，而令旌善五營專追白逆，阻河漲不得渡，

時白逆舍止隔河十里許造飯，掩襲可擒也，而我軍遽返。錦棠聞之，大怒，責令復進，則已走喀什矣，「方湘軍取南路，意在白彥虎，以黃萬鵬旌善五營馬隊精悍，令充前部，晝夜追之。兵與賊皆陝回，往往陣前相揖問，或暮夜往還。」(註 119)至是有如上述說是「軍中謂白賊之不獲，由回兵走泄軍機云」的記載，甚至說解放初「據恭門鎮原在新疆作戰時，在追白彥虎的最後關頭，崔偉對白彥虎有意縱放，崔對白說，現在左宗棠一定要除掉你，你捨去出走再無生路，因此崔給白部支授了武器糧草，讓其出走俄境。另外在追趕過程中，崔對白始終佯追不擊，有時兩軍相遇甚近，他們在馬上互道色倆目，致意問候。」(註 120)當然崔偉、白彥虎均為出身陝回起事的重要人物，他們在西寧之役後，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對同樣的穆斯林教胞是有一份情誼在，但崔偉等在河湟對向陽堡、大通、肅州及河州南鄉閔殿臣諸役的平定之忠誠表現，深得左、劉等的肯定與信任，故委之專追白彥虎之重責大任，甚至左宗棠尚叮嚀再三，且又有黃萬鵬的管帶，有時甚至有清軍或「董福祥的部隊壓陣」(註 121)，縱有緩進開脫之心，其何能瞞天過海，陣前「給白部支援武器糧草」的妄為舉措？崔偉等或許有不為左宗棠「懸示重賞」、「威逼利誘」所動搖，但斷不致是「對白彥虎網開一面」，而說是與其在「向陽堡、肅州、河州之舉」之「本質和轉變」(註 122)，否則豈不是左、劉之不察，黃萬鵬督帶不力、監督不周，而又能累功官至「總兵」？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功在邊域的旌善馬隊，在清軍圍于民族偏見下仍有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情事發生。光緒四年(1878)六月，「旌善營差赴西湖買馬弁勇共二十三名，行至瑪納斯概被殺害」，此一被殺害兵勇查系畢大才「所派黑萬貴等二十三人赴瑪納斯一帶，採買戰馬」者，他們是奉官差命持銀兩赴瑪納斯採買戰馬，卻被駐防清軍俞應鈞、孔才等「因其時有中途被搶之事」而誤以為「起內有馬三一名，系余小虎黨羽，因此生疑」，「頓起殺機」，致「將此旌善回勇喝令綁斫斃命」，且事發後，孔才、俞應鈞又互相推委，「任意添捏姓名，改造情節具稟。」(註 123)此一事件，引起了旌善馬隊官兵強烈的不滿，為了平息憤慨，總統領劉錦棠將這一嚴重慘害回勇案件察明稟報左宗棠定奪，責成甘肅臬司承審，左宗棠並在《甘肅史臬司稟請將俞應鈞擅殺旌善營回勇多命一案據情奏結仰請旨敕部定擬由》的批示中認為「案關故殺無辜多命 革員孔才與俞應鈞派隊會銜，目見俞應鈞喝殺多命，事前既未勸阻，事後並會銜捏詞具稟，是知情同謀，罪有應得，應照俞應鈞罪名減等定擬」，最後「奉旨按律」，依「刑律人命一門所載，分謀、故、歐、戲、誤、過失六殺，本為凡人而設，職官犯此律無專條，尤應比附定批，請旨交刑部核議示遵，以照平允。」(註 124)

光緒六年(1880)七月六日，清廷以「現在時事孔亟，俄人意在啟衅，正須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備朝廷顧問」為由，要「左宗棠著來京陛見」(註 125)，十月「左宗棠自哈密入關，赴蘭州，俟交陝甘總督篆務，即由秦晉北上。劉錦棠既至哈密，領欽差大臣關防」(註 126)，而旌善馬隊隨左宗棠裁撤入關，易地安置。左宗棠曾以「查關外近來所報捨竊、拐騙、賭博各案，多由從前軍營游勇及安插內地回民流落各處勾結為奸所致，前此旌善營隨征出關，即

有安撫各處回民附營行走，或備稱餘丁，或借稱買賣，混雜其中，無從查認。迨至凱撤入關，若輩即流連忘返，潛蹤異域，成為匪徒，雖迭經從嚴懲辦而所傷已多，故為禁此兵馬控餽之際游勇擾民。同時對回勇的遷徙妥適安插，左宗棠通飾玉門、安西、哈密各廳州縣，嚴查隨營游勇人數、故其在《札統帶旌善營陶提督鼎金等嚴查隨營游勇》的札件中批示：「此次札調總兵崔偉、畢大才等五員招募回勇」五百名，除回勇每十名准帶伙勇一名外，不准擅帶回民隨營出關，致滋混冒，「應節陶提督鼎金，王提督福田、楊提督文彪等，傳諭各旗官懍遵知照，切實嚴查。倘有徇情隱帶游勇出關，一經查獲，定唯各旗官是問。見當整軍出關之時，應節嘉裕關游擊按名點驗，凡冊內無名者不准隨行。並飾玉門、安西、哈密各廳州縣，于旌善各旗過境能嚴查具報，以期一律整飾嚴肅戎行。」（註 126）由於左宗棠的此一禁令，也使得「不少由白彥虎帶往新疆的陝甘回民以及旌善五旗隨軍人員滯留關外，不能還鄉。」（註 127）除光緒三年（1877）底隨白彥虎入俄境四千餘人外，「陝甘回民落居昌吉、奇台、吉木薩爾、米泉、瑪納斯縣一帶」，這些回民「以省籍而聚居，所建坊寺亦以省籍而命名，如現在昌吉的幾座較有名的清真寺就是以陝西大寺、西寧寺等冠以名稱的。另外哈密地區尚流落定居一部分陝甘回民，這些回民就是當年左宗棠從哈密進京時留下的旌善五旗回民和肅州大屠殺逃出的部分回民。」（註 128）而以崔偉為首的旌善五旗馬隊，光緒六年（1880）年底隨左宗棠入關後駐防張家口，陸續擔負邊防重責大任，崔偉本人亦於新疆軍事抵定時被保荐，以「提督記名簡放兩更號，當戴花翎並賞正一品封典」，誥授為「建威將軍」並於光緒五年（1879）仲春，左宗棠親書「忠誠可法」匾額一座旌表其功。他被「派赴張家口防督，光緒七年交卸，陛見回，又帶武毅左旗（筆者按：即旌善馬隊改編者），借補前營游府（筆者按：在蘭州），歷任八年，整飾營務，慎重操防，深為各寶憲所倚重」（註 129），十七年（1891）十一月二十八日，「崔偉六十壽辰在蘭州游府，由欽定六品銜升用縣丞候補主簿沙培金及書教授登仕郎吏部候選從九門生曹兆綬」等十一名在甘文武官員發起祝壽活動並聯名撰寫了《恭祝建威將軍耀峰軍門崔老大人六旬榮慶祝文》，對其為人處世和社會活動予以總結。」（註 130）然而他卻在光緒十九年（1893）五月十七日在「游府任內一病不起，臨終前曾遺囑歸葬陝西鳳翔府崔家洼先塋，以途遠不便，遂葬於蘭州東門外拱北之傍」，崔偉墓碑「系其胞弟管帶武毅左旗馬隊留甘督標參將銜盡補用游擊崔岳率子侄輩於光緒二十年（1884）夏五日所立。」（註 131）

三、結 語

光緒六年（1880）底入關後的旌善五旗馬隊於七年（1881）至宣統三年（1911）間被清政府一改編為武毅左旗馬隊再改編為驍銳軍。依崔偉墓記文所述崔偉在蘭州死後，武毅左旗馬隊的統帶官為其弟崔岳所接替，據《陶勤肅公奏議遺稿》卷六記載：「崔岳，以武生投效軍營，同治光緒間隨大軍剿回匪、番匪，歷保游擊，光緒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前督臣楊昌濬委帶

武毅左旗馬隊。」(註 132)而《崔氏宗譜》載崔岳為崔偉胞弟，在崔偉於光緒十九年(1893)五月十七日逝世後，僅隔十天，於「五月二十七日」，由「前督臣楊昌濬委帶武毅左旗馬隊。」(註 133)至光緒二十二年(1896)二月初一日崔岳病歿，「所遺武毅左旗馬隊，楊昌濬委其侄梨園營都司崔金魁接帶，駐紮臬蘭」(註 134)，二十五年後，據《崔氏宗譜》記載，崔金魁「卒于宣統三年(1911)十一月二十一日」(註 135)，後由崔正午於「宣統辛亥帶甘軍驍銳軍。」(註 136)如此崔偉後的旌善馬隊名稱經兩次易名和統帶官三次更替，最後一任為崔正午，而「崔正午字時齋」，「陝西鳳翔人」，出身行伍，「勇敢善戰，清光緒年間佐崔偉平定新疆，積功保副將」(註 137)在旌善馬隊五旗中，「以崔偉為統領，崔正午為分統」(註 138)，他是「崔三(崔偉的本家)。」(註 139)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六月，因義和團事件引起的八國(英、美、俄、日、法、德、意、奧)聯軍，入侵北京，時任「甘肅藩司(布政使)的岑春煊」請准於陝甘總督陶模，令「駐紮蘭州崔正午所部騎兵五營」，加撥「步隊三營」赴援，至途中，北京已開戰，董福祥部回民「簡練軍」統領馬福祿(壽三)「親自督戰殺數十百人，亂稍卻，功垂成矣，忽飛丸貫其腓，遂殉焉。」(註 140)而慈禧太后與光緒帝等倉促西行，至「河北懷來縣境，即和趕來觀王的崔正午部馬步八營旗相遇至此才有了扈駕的衛兵。」(註 141)崔正午部遂首次護衛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西逃至長安，這就是史載『沿途扈蹕侍從』的由來。」(註 142)事平後，崔正午論功行賞，被保署為「陝西蘭州協台，後調署甘肅平番協鎮數年」(註 143)，清政府並為其在移居地甘肅清水縣恭門鎮(現歸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管轄)建造了一所「總鎮都督府」，至今「這座造形奇特的督府中門樓依然存在，並受到張家川回族自治縣文物管理部門的保護。」(註 144)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的北京政府，曾授崔正午為陸軍中將，其所部馬隊，改編以「驍銳軍」駐防秦州(今天水)。民國二年(1913)，河南寶豐縣白朗之變，次年(1914)破紫金關入陝，崔正午奉甘肅督軍張廣建之令，在陝甘之交的關山頂防堵，而崔正午以救鳳翔故，卻率部赴鳳翔被敗，此舉為由旌善馬隊，一編為武毅左旗馬隊，再改編為驍銳軍的餘響劃下句點。而嗣後，「幸趙倜大軍次隴州，正午往投之，倜即用為嚮導，令殘敗軍隊隨同入甘。」(註 145)崔正午本人經由「河南督軍趙倜電保河南行營監察使，不數年因病辭職，回里病故」(註 146)，所以清季西北的回民旌善馬隊從此「遂告結束」。然其在同光年間的清軍西征與庚子禦侮，其與董福祥的甘軍對清代中國的影響，雖功過爭辯殊異，但其所起的西北綏靖與新疆收復作用，頗值吾人深思並予肯定。

參考文獻

- 註 1：吳萬善，《清代西北回民起義研究》（蘭州，蘭州大學，1991 年），頁 169。
- 註 2：馬通，西北回族穆斯林的過去與未來 《西北民族研究》二期（蘭州，西北民族學院，1992 年），頁 161。
- 註 3：張廷玉，《明史》卷三二二列傳二二〇西域撒馬爾罕傳（台北，鼎文書局，民國 65 年），頁 8598。
- 註 4：吳明士，甘肅的回教 《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肅分冊（蘭州，甘肅省圖書館，1984 年），頁 447。
- 註 5：台灣故宮博物院，《軍機處檔，月摺包》第 2705 箱，132 包，030804 號，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大學士阿桂、陝甘總督李侍堯等覆奏。
- 註 6：台灣故宮博物院，《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四九輯（台北，故宮博物院，民國 75 年）頁 271，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七日，陝西巡撫畢沅奏摺。
- 註 7：阿帕克和卓（ ，Apak Khoja）是回疆和卓開始真正掌握實權的第一人，其原名為伊達雅圖勒拉（Hidayata-1-Lah）和卓，噶爾丹征服南疆時，以其為「六城總督」，並封他為 Apak 和卓（因 Apak 在準噶爾中為最尊貴的頭銜）。有關 Apak 一詞劉義棠以為是由形容詞， -Aq, Ak（白色、白的）的再重複 - -Aq-Aq 口語讀作為 Appag, Appak, Apak，意義為白白的，引申為非常榮譽、非常高貴的意思。至於 Apak 和卓，哈薩克學者瓦里汗諾夫（Valikhanof）曾說：「Apak 和卓極受人民敬仰。此教師兼聖人的高度聲望，吸引了許多東方的年青回人到喀城，他們渴望能步上此聖人的後塵。甚至河中區（Maveraunehr）的一些統治者，也是他的門徒。其在喀城的墳墓，迄今仍然吸引了許多回教國家的朝聖者。新疆人則視之為專有的守護神。常呼叫他的名，當他們有危險的時候。」所以說 Apak 和卓的精神力量不只在當代著稱一時，對後人亦深具影響力。我想這也就是回疆歷來亂作，均以其後裔為首，並以之為號召之故。請參考 M. V. Valikhanof, 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 PP.168-169；陳慶隆，論白山黨（Aktaglik）與黑山黨（Karatagilk），《邊政研究所年報》二期（台北，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民國 60 年），頁 217-218 及劉義棠維吾爾語文上課講義。
- 註 8：納合西班底教團（Nakshbandiye）屬伊斯蘭蘇菲派（Sufism），十四世紀時由「塔吉克族巴哈丁（一三一八—一三八一）在布哈拉創建。因該派舉行宗教儀式時，教徒須隱聲低唸「齊克爾（ -Dhikr, recollection、remembrance），」（Dhikr 一字原為阿拉伯文，唸、頌唸，到維吾爾文成 -Zikir 本義為記誦，此指唸唸不忘真主的尊名，源自基督教的祈禱，是伊斯蘭中唯一複雜的儀式）及默誦經文並在胸前畫線，表

示強化心靈，故將巴哈丁稱為「納合西班」，意為畫家。教團也因此得名且其所傳之道有被稱為「和卓崗之道」(-Tariqayikhojagan) 因此又有被稱為「和卓崗」(Khojagan) 者，詳見趙秋蒂，《新疆依禪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3 年)，頁 47、74-75；馬通，《中國伊斯蘭派門宦溯源》(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6 及陳國光，《中亞納合西班底教團與我國新疆和卓西北門宦》，《世界宗教研究》第一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88 年)，頁 107。

註 9：蘇菲教團(al-Tariqah al-Sufiyyah)，伊斯蘭教蘇菲派常設性的諸多兄弟會團體的通稱亦譯為互助會，西方稱為教團。詳見楊克禮等主編，《中國伊斯蘭教百科全書》蘇菲教團條(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 年)，頁 527。

註 10：「依禪」為 -Ishan 之音譯，譯寫為「依善」、「依鄙」或「依先」，中亞又稱「伊山」者，均為源自波斯文，第三人稱多數，即「他們」之意的不同漢文音譯。瑪哈圖木阿雜木長子瑪木特額敏有「依禪尼卡蘭」之稱，故蘇魯克(-Suluk，阿拉伯文源意「道路」，在此指教團之派別)稱為 -Ishaniyya，新疆依禪派之起源即由此開始。瑪木特玉素普在新疆，其領導之組織稱為 Ishaniyya - 依禪派，在他之後，本支繼任領導人皆有依禪之尊稱(演變至此，依禪成為各種教派職位稱號)這是最早依禪派名稱，亦是狹義的依禪教派，日後，新疆地區的蘇菲主義派別都被通稱為依禪派。廣義的依禪派別也涵蓋了所有新疆蘇菲信眾而成為新疆地區蘇菲信仰者共同的名稱，它源自中亞是早期神秘主義和蘇菲神學演化而在新疆發展的結果，再傳到我國西北又形成門宦形式，此與清代新疆黑山派、白山派之爭，甚至西北教爭都有密切關係，詳見陳國光，《新疆伊斯蘭教史上的伊斯哈克耶》，《世界宗教研究》一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87 年)，頁 90；王守禮，《新疆伊禪研究》，《西北伊斯蘭教研究》(蘭州，甘肅省民族研究所，1985 年)，頁 288 及趙秋蒂，前揭文，頁 98。

註 11：「門宦」一詞淵源說法不一，目前多數人認為來源於漢族之「宦門」、「門閥」一詞，表明一種封建世襲身份的特權，詳見馬通，《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制度史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74-75。

註 12：同上註，頁 70。

註 13：聖戰，即吉哈德(-dji had)源於阿拉伯文動詞 -djahada，為奮鬥、盡力之意，其宗教含意，有為傳播伊斯蘭信仰而奮鬥的意義。在伊斯蘭教義中聖戰是一種義務，且是真主指引到達天堂最直接之路。參見 M Khaddur, War and peace in the law of Islam (The Johns Hopkins : 1955), PP.56-57 及蕭憲，《伊斯蘭教吉哈德理論在當代的發展和演變》，《世界宗教研究》第二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頁 32。

註 14：張豈之等主編，《陝西通史》明清卷(西安，西北師大，1998 年)，頁 191。

- 註 15：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長沙，岳麓書社，1984 年），頁 62。
- 註 16：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四（長沙，岳麓書社，1996 年），頁 71。
- 註 17：秦翰才，前揭書，頁 60。
- 註 18：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四，頁 71。
- 註 19：趙爾巽，《清史稿》校註本列傳一之九，劉松山（台北，國史館，民國 79 年），頁 10127。
- 註 20：何維樸，《劉襄公史傳稿》宣統二年錄複印件，湘鄉市志辦公室藏，頁 2。
- 註 21：秦翰才，前揭書，頁 61。
- 註 22：同上註。
- 註 23：馬俊民等，《唐代馬政》（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 84 年），頁 1。
- 註 24：秦翰才，前揭書，頁 62。
- 註 25：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一，頁 43。
- 註 26：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四，頁 168。
- 註 27：同上註，頁 171。
- 註 28：同上註，頁 191。
- 註 29：同上註，頁 285-286。
- 註 30：同上註，頁 286-287。
- 註 31：同上註，頁 288-289。
- 註 32：同上註，頁 249。
- 註 33：同上註，頁 313。
- 註 34：同上註奏稿五，頁 125-126。
- 註 35：同上註，頁 3。
- 註 36：同上註，頁 17。
- 註 37：吳萬善，前揭書，頁 169。
- 註 38：楊毓秀，平回志 卷六《回民起義》三（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 年），頁 180。
- 註 39：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件，頁 503。
- 註 40：楊毓秀 平回志 卷六《回民起義》三，頁 181。
- 註 41：同上註。
- 註 42：同上註。
- 註 43：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頁 184。
- 註 44：楊毓秀，平回志 卷六《回民起義》三，頁 185。
- 註 45：曾毓瑜，征西經略 卷三《回民起義》三，頁 39-40。
- 註 46：楊毓秀，平回志 卷六《回民起義》三，頁 185。
- 註 47：易孔昭，《平定關隴記略》卷十二（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國 57 年），頁 5。

註解：

- 註 48：楊毓秀，平回志 卷六《回民起義》三，頁 188。
- 註 49：固原縣志編委會，《固原縣志》（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4。
- 註 50：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四，頁 354。
- 註 51：同上註，頁 354-356。
- 註 52：同上註，頁 317。
- 註 53：同上註，頁 505-506。
- 註 54：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頁 14-15。
- 註 55：同上註，頁 64-66。
- 註 56：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頁 68。
- 註 57：同上註，頁 105-106。
- 註 58：同上註，頁 401。
- 註 59：楊毓秀，《平回志》卷六《回民起義》三，頁 186。
- 註 60：易孔昭，《平定關隴紀略》卷十二，頁 5。
- 註 61：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頁 405-406。
- 註 62：易孔昭，《平定關隴紀略》卷十二，頁 5。
- 註 63：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頁 425。
- 註 64：曾毓瑜，《征西紀略》卷三《回民起義》三，頁 40。
- 註 65：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頁 469。
- 註 66：酒泉地委，《酒泉史話》（酒泉，酒泉地委，1984 年），頁 31。
- 註 67：易孔昭，《平定關隴紀略》卷十二，頁 22。
- 註 68：同上註。
- 註 69：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書信三，頁 409。
- 註 70：蘭州軍區作戰部，《中國西北歷代戰事例評》，（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14。
- 註 71：何維樸，《劉襄勤史傳稿》，頁 14。
- 註 72：易孔昭，《平定關隴紀略》卷十二，頁 33。
- 註 73：吳萬善，前揭書，頁 130。
- 註 74：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六，頁 137-138。
- 註 75：同上註，頁 139。
- 註 76：易孔昭，《平定關隴紀略》卷十二，頁 43。
- 註 77：曾毓瑜，征西紀略 卷四《回民起義》三，頁 46。
- 註 78：同上註。
- 註 79：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六頁 508。

- 註 80：奕訢等，《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三，頁 10。
- 註 81：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六，頁 508。
- 註 82：奕訢等，《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三，頁 20 21。
- 註 83：馬國強，崔偉其人及崔氏宗譜 文載《甘肅民族研究》一期(蘭州，甘肅民族研究，1990 年)，頁 98。
- 註 84：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書信三，頁 133。
- 註 85：楊毓秀，平回志 卷七《回民起義》三，頁 208。
- 註 86：曾毓瑜，征西紀略 卷四《回民起義》三，頁 46。
- 註 87：黃炳琨，戡定新疆記 卷三《回民起義》四，頁 362。
- 註 88：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六，頁 656。
- 註 89：同上註，頁 657。
- 註 90：庫羅帕特金著，中國社科院近史所譯，《喀什噶爾》(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頁 224。
- 註 91：楊毓秀，平回志 卷七《回民起義》三，頁 209。
- 註 92：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六，頁 657 658。
- 註 93：曾毓瑜，征西紀略 卷四《回民起義》三，頁 47，而有關阿古柏之死，庫羅帕特金，《喀什噶爾》漢譯本，頁 226，載為中風死去；而包羅杰，《阿古柏伯克傳》漢譯本，頁 203，則說是「他被以阿奇木汗妥拉為首(同書頁 204，一說是布素魯克子，一說是庫車的一個和卓)的一群陰謀者殺害了」，又同書同頁亦引當年《泰晤士報》和《土耳其斯坦報》說是患熱病死。
- 註 94：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六，頁 755 758。
- 註 95：曾毓瑜，征西紀略 卷四《回民起義》三，頁 48。
- 註 96：馬國強，前揭文，頁 97。
- 註 97：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件，頁 534。
- 註 98：同上註，書信三，頁 294。
- 註 99：同上註，奏稿六，頁 776 777。
- 註 100：同上註，頁 800。
- 註 101：同上註，頁 800 801。
- 註 102：柳用能，阿古柏最後覆滅的歷史見證 新疆喀什明約路石碑，《新疆大學學報》三期(烏魯木齊，新疆大學，1979 年)，頁 51，
- 註 103：楊東梁，《左宗棠評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233。
- 註 104：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卷二十四(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 52 年)，頁 21。
- 註 105：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書信三，頁 504。

- 註 106：王定安，《湘軍記》卷十九(台北，文苑出版社，民國 53 年)，頁 22。而對此穆淵則提出質疑，詳見其《左宗棠與擬出關新探》，《新疆大學學報》一期(烏魯木齊，新疆大學，1987 年)，頁 56-59。
- 註 107：楊毓秀，平回志 卷八《回民起義》三，頁 230。
- 註 108：馬國強，《崔偉傳》(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 年)，頁 103。
- 註 109：單化普，陝甘劫餘錄，《回民起義》四，頁 314。
- 註 110：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件，頁 416。
- 註 111：同上註，奏稿七，頁 36。
- 註 112：同上註，奏稿六，頁 776。
- 註 113：馬國強，前揭書，頁 98、101。
- 註 114：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件，頁 410。
- 註 115：同上註，頁 412。
- 註 116：馬國強，前揭書，頁 99。
- 註 117：慕壽祺，《甘寧青史時》正編卷二十四(台北，廣文書局，民國 61 年)，頁 6。
- 註 118：馬國強，前揭書，頁 99。
- 註 119：曾毓瑜，征西紀略 卷四《回民起義》三，頁 48、49。
- 註 120：馬國強，前揭書，頁 100。
- 註 121：馬國強，前揭書，頁 99。
- 註 122：同上註，頁 101。
- 註 123：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件，頁 459、462、463。
- 註 124：同上註，頁 464。
- 註 125：《清實錄》光緒朝卷一一五，頁 6-7。
- 註 126：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件，頁 565，而原管帶旌善馬隊之黃萬鵬新疆平定後，光緒四年「乞歸省，越二年，仍赴新疆治軍」未隨旌善馬隊裁撤入關，詳見趙爾巽，《清史稿》校註本，列傳二四二(台北，國史館，民國 79 年)，頁 10618。
- 註 127：馬國強，前揭書，頁 107。
- 註 128：同上註，頁 108。
- 註 129：同上註，頁 119。
- 註 130：同上註，頁 115。崔偉「字耀峰生於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二十八日，陝西鳳翔城蘭崔家洼人」，因排行老三，又名崔三，清官方文牘有稱其名崔巍者，「幼喜武略，身長八尺軀幹魁梧，思者異之」，他「是趕馬車出身，俗稱為馬客」常「往來于北山與鳳翔間」詳見馬國強，崔偉其人及崔氏宗譜，《甘肅民族研究》1990 年 1 期，頁 98。
- 註 131：同上註，頁 117。

- 註 132：陶勤肅公奏議遺稿 卷六《回民起義》四，頁 449。
- 註 133：《崔氏宗譜》，引自馬國強，前揭書，頁 119-120。
- 註 134：陶勤肅公奏議遺稿 卷六《回民起義》四，頁 449。
- 註 135：馬國強，崔偉其人及崔氏宗譜，《甘肅民族研究》1990 年 1 期，頁 94。
- 註 136：民國版，《清水縣志》卷十一人物志下，頁 10，引自馬國強，前揭書，頁 120。
- 註 137：依民國版，《清水縣志》卷十一人物志下，頁 10 及崔偉親孫的《崔蘊山遺稿》新載，引自馬國強，前揭書，頁 123。
- 註 138：馬國強，前揭書，頁 121。
- 註 139：崔正午與崔偉關係，有說是崔正午為崔偉之弟或後人、本家者而依《崔氏宗譜》中並無明載。但依崔偉之後，軍權更替先由其胞弟崔岳次由其侄崔金魁再由崔正午接替過程，馬國強以為「崔振武(崔正午)是崔三(崔偉)的本家」詳見，慕壽祺，《甘肅青史略》正編卷二十八，頁 19；馬長壽，鳳翔縣調查記錄，《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歷史調查記錄》，頁 349 及馬國強，前揭書，頁 122。
- 註 140：梁冕，庚子之變中的馬福祥，《寧夏三馬》，頁 4，引自馬國強，前揭書，頁 126。
- 註 141：馬河圖，驍銳軍統領崔正午的幾件事，《張家川文史資料》二輯，頁 196，引自馬國強，前揭書，頁 126。
- 註 142：同上註，馬國強，前揭書，頁 126。
- 註 143：崔璠，《崔蘊山遺稿》引自馬國強，前揭書，頁 126。
- 註 144：同上註，馬國強，前揭書，頁 126。
- 註 145：慕壽祺，《甘肅青史略》正編卷二十八，頁 20。
- 註 146：崔璠，《崔蘊山遺稿》，引自馬國強，前揭書，頁 128。